

佳木斯文史资料选辑

第 二 輯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佳木斯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佳木斯

目 录

苦难的人民，坚强的斗志

——我在抗日时亲历的二三事……（1）

于学会口述 袁 丁整理

电报生涯五十年……（14）

陶詒谔口述 刘天光整理

我的京剧生涯……（37）

赵云樵口述 胡光 于全整理

佳木斯武术运动概况……（60）

杨传山

附录：征稿启事

苦难的人民，坚强的斗志

——我在抗日时亲历的二三事

于学会口述 袁丁整理

一、参加抗日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时，我才二十五岁。当时我家住在汤原县东的陷马沟。这里地处小兴安岭南麓，松花江北岸，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虽然旧中国政治腐败，兵劫匪患连年发生；但因这里交通不便，跟外界少有来往，人们的生活还可年收年用。我除了能种田之外，还会点木匠手艺，生活比一般农民又略好些。

一九三一年是个丰收年！我国北方乡村的秋天非常美丽，雁阵在蔚兰色的秋空中向南飞去，一场清霜把山峦，田埂上的枫树染红，农户的茅屋檐下挂着黄灿灿的苞米棒和火红的干辣椒……这真是一幅色调鲜明的风景画。人们正以喜庆丰收的心情在迎接一年一度的仲秋节，这时一个噩耗象一片乌云似的突然笼罩在人们的心头——日本鬼子打进来了！立刻我们这个小村便失去了往日的宁静，人们深深陷入沦为亡国奴的恐怖之中！

当时在松花江北岸驻扎着几部分中国的军队，有什么屠旅、熊旅、老五团等，他们都按兵不动。等一九三二年四月

日本军队开到以后，他们有的被打“花拉”了成为散兵游勇；有的归顺日寇成为伪军。总之到这时，天上飞着贴着“膏药”旗的日本飞机；地下到处是日寇、伪军和土匪，兵慌马乱。偏赶上这一年又涨大水。从一开春就阴雨连绵，人们都说“犯甲子”了，得下七七四十九天，其实足足下了半年还多。江河水位猛涨，加上堤防不修，泛滥成灾，佳木斯的北市场都能行船。这真是天灾人祸的年头。

中共中央于“事变”发生后的第五天——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发出了抗日救国的伟大号召。一九三二年初在汤原一带组成了以夏云阶为首的反日游击队。这支抗日队伍和老百姓亲如一家，出去就是兵，回屯就是“民”，打得日伪晕头转向却找不到队伍在哪儿。他们常出入我们村子，经常向村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敌伪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使抗日的道理更加简单易懂了，所以村里的青年有时也跟队伍一起出动，并帮助他们搜集情报、购买东西。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成立了伪三江省，并把省会定到佳木斯，佳木斯就成为抵制、镇压下江一带抗日活动的中心。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对抗日武装积极进行围剿的同时又在乡下大力推行一家“犯法”九户“同罪”的《十家连座法》。正在这时有人向日寇告发，说我“通匪”。我在家乡呆不住了，便于一九三四年夏季参加夏云阶的反日游击队。

二、策动唐殿祥反正

到一九三六年秋我已经在游击队里干一年多了。当时战斗频繁，披星戴月，风餐露宿，有时几天几夜得不到休息和

饮食，条件艰苦到了极点。这样除了战斗减员外，自然减员率也在不断提高。部队为了提高战斗力，把病、伤员都分别做了安排。我当时正在患吐血、便血病，领导上决定叫我到地方上工作。一九三六年夏末秋初我到格区工作。

佳鹤线铁路西有一条南北流向的小河叫做乌龙河，也叫半截河。人们把乌龙河东岸这块地方叫“龙区”。我的具体工作地点就在乌龙河以东，佳鹤铁路以西，松花江以北这个地方。我们的区委书记名叫金柏芳（外号金胖子）救国会会长曹喜林，妇救会会长是由一个三十出头的、姓傅的妇女担任。金柏芳告诉我，上级安排我担任区的肃反部长。人们都叫我“吴大个子”。为了帮助我熟悉情况，又派一个名叫“王老五”的人，做我的助手。（这个人当时三十二、三岁，会吸大烟。）

不知内情的人都把肃反部叫做“打狗队”。这种“打狗队”的队员各屯都有，有事就行动，无事就是一般农民。它的具体任务就是锄奸，专门处置敌特和监视可疑份子，以保证游击队和地方组织的安全。据伪《三江省公报》透露，叛徒张秀峰供认：“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三月中旬，逮捕一名潜入一保的密探被绞死。同年四月有行迹可疑者侵入一保居民王兰住宅，遂将其逮捕，并用上述同样手段杀害……”伪三江省警务厅也承认：仅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在汤原境内就有二十余名密探被我肃反部门处死。所以，那些沾腥味的人对“打狗队”非常眼晕。

我到这个地方不久，有人告发二保住户唐殿祥（外号唐大虎）是鹤岗日本宪兵队的特务，但劣迹不多。

我们这块地方离佳木斯近，离鹤立县更近，周围完全是

敌伪势力，处境十分艰险，要想从城市弄点军用物资来就更困难。这个客观环境决定，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找到一个（多了更好）在敌人内部为我们工作的人。经过研究，我们决定：把他争取过来，挂着特务招牌而为我们工作。于是我们故意放出风去，说：“唐殿祥虽然当了特务还没良心丧尽”，看看他有什么反应？果然唐殿祥一听到这个消息是既害怕，又感到还有出路。所以他到处托人向我们说情，并表示要立功赎罪。这正是我们原来要得到的结果。但因当时敌我斗争异常激烈，我们不敢轻信一个正在当特务的人。

唐殿祥有个亲戚叫梁凤山，他家住在套子里。梁凤山与我们的地方干部王宝坤是好朋友，唐通过梁求王宝坤向我们疏通。由唐殿祥提出个会面地点——在套子里孙大骡子家中见面。但是，我根本没去。一是要考验一下唐的诚意；二是怕坠入敌人的圈套，只是派王老五从侧面了解一下，然后据此判断唐的真正意图。唐没见到我，摸不清我们态度更害怕了，他急忙找到梁凤山、王宝坤，说了很多决心抗日的話，然后他又约我在毛家街陈维新家中见面。这一次我又没去，只是叫王老五到场，声称我太忙不能赴约。他越是见不到我，他心里越没底，因此他的话也越接近真实，反来复去起誓发愿。实际这两次约会都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我根据王老五的汇报，认为唐殿祥确有反正的诚意，叫王老五通知他：“下次约会，吴大个子保证到场。”并对会面环境的安排提出要求：一、不准唐携带武器；二、不准唐穿长衣服；三、不准在会面的屋里炕上铺被褥及放炕桌。唐答应：“照办”。并把会面地点订在于家沟“于吹”的家里。

这是一九三六年的九月间，我和王老五从套子里向于家

沟走去。满山红叶，秋高气爽，但看到荒田遍野和一些倒塌的草屋，有一种家园残破、骨肉流离的感觉，一路上我俩谁也没吱声，东南晌时我们走进了于家沟来到“于吹”的家门前。

“于吹”是吹鼓手，现在应该叫他演奏家；但在旧社会这些艺人的生活是很苦的。他会吹唢呐，笙管笛箫也都弄得来。在乡下他只能给有钱的人家在办红白喜事时奏奏乐，实质跟花几乞丐差不多。他家住在于家沟南头一幢东倒西歪的三间东厢房里。我和王老五来到他家的秫秸障外面，见院里静悄悄的。我们见左右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便没打招呼，直接先后走进屋里。这时在中间屋里东炕的炕沿边上，正坐着一个身材修长的人与王宝坤唠嗑。见我王老五突然走进便慌忙地站立起来，脸上露出一种尴尬的假笑。

这时王宝坤站起来从旁介绍，指着告诉我：“这就是老吴。”

我用眼警惕地在室内搜索一番，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便坐在炕沿上。

唐殿祥有三十左右岁的年纪，留着正分头，长卦脸是又灰又黄，看得出他是个抽大烟的人。他那双无神的大眼经常出现一种探询的目光，心里忐忑不安。上身的驼色毛衣盖在青色拾夹裤的裤腰外，脚下穿一双礼服呢面的圆口便鞋，整个打扮不城不多，土洋结合。他向我讲了一些愿意弃暗投明的话，我鼓励他快点改邪归正，全民族一致对外把日本鬼子打出去。

这时“于吹”已经点上大烟灯，唐殿祥反复让我抽大烟，我说我不会吸，然后唐殿祥、王宝坤、王老五三个人换

炕抽起大烟来。没一会儿，“于吹”的妻子做好饭菜，我们边吃边商讨如何供给游击队军需物资问题。我提出：

第一、立即想办法弄到“七九”、“三八”、“连珠”步枪子弹各五百发，各种枪支不论长短多少都行；

第二、在封冻之前给弄到马掌五百付，靰鞡二百双，棉衣二百套；

第三、随时为我们提供敌伪军事、政治各种情报。

我保证，货到付钱，并随时把他的表现向上级汇报，保证他在游击区内活动时的人身安全。

最后唐殿祥表示：“一切照办”，用这些行动表示自己对抗日事业的忠诚。

从一九三六年秋到一九三七年夏，唐殿祥为我们做了很多工作。由于他挂着日本特务的招牌，他所弄到的军用物资都顺利地通过敌伪各种关卡，被送到游击队手中。一九三七年麦秋时，又是唐为我提供了日寇行动的重要情报，使我和“抗联”六军三师周师长及时转移，免于罹难，以后唐殿祥因为给我们办事马脚高了，被日寇发觉而被逮捕，后越狱，被我安排到六军三师工作，以后牺牲。

三、尚家街惨案

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腾出身手对中国本土大举进攻，首先必须巩固其在满洲的统治，所以在一九三六年以后，以植田谦吉为司令官的，以坂垣征四郎为参谋长的关东军在下江一带集结了大约两万五千人的兵力，又有伪第七军管区的“张英”（张英魁）部队、“林宽”（日人林亮宽一）部队的配合向我“抗联”三、四、六军进行了大扫荡。在与军事

同剿匪同时，日寇又在东北全境大力推行“并屯集家”政策，把中国人民从星罗棋布的自然村中赶到“集团部落”里去，制造了广大的无人区。这类“集团部落”周围挖成丈余深的“城壕”，用挖出的泥土就地筑成高墙，并在墙脊上安装“刺鬼”（铁蒺藜），出入口设置岗哨，由全副武装的自卫团员轮流站岗，人们出入要受到检查和盘问。

很明显，如日寇这一阴谋得逞，自然村随之消失，我游击队就失去了后方依托再难得到地方救国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当时我们接到上级发下来的抵制这一阴谋的口号，内容是：“怎能在自己的屯落，烧毁自己的房屋，离弃祖先的坟墓，走向杀害中国的屠场呢！”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和金柏芳、曹喜林、妇救会的傅会长、地方干部王宝坤，还有表面给敌人当甲长的“刘晃胡”，我们几个人走屯串户宣传这个口号的意义，教育人们不要执行敌人的野蛮政策。

俗语说：“敌上难离”，这里既有感情因素，也有实际困难。在旧中国——特别是敌伪统治时期，人们的生活已经低到了仅能维持生命的程度，多少年才能弄到一幅勉强容身的茅草房屋和一些破破烂烂的生活资料？搬家就意味着毁掉一切。仅是这一点，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抗。所以我们的宣传教育犹如火上浇油，各屯都用软拖磨泡的办法，对“并屯集家”政策进行抵制。正在这时，尚家屯的一家姓尚的住户提出要往“大屯”里搬。

尚家屯有兄弟三人，虽不是地主、富农，却是“土包子开花”，特别是尚老三，他还在鹤立镇警察署署长杜本方名下当一名警察。亲日的倾向是明显的！我们听到这一消息之

后，先是对他们进行劝说；继则进行阻拦。他们见我们不让搬家便想出了坏主意，由尚老三出面向鹤立县日本宪兵分队告密，说尚家街的人统统的“通匪”。

日寇正苦于缺乏镇压中国人民反抗“升屯集家”政策的借口，得到这个告密，自然喜出望外。日寇要镇压尚家街人民这个消息，被我在鹤岗日兵宪兵队里工作的唐殿祥刺探到了。他把这个消息通过交通转告于我，希望躲一躲。

这是一九三七年新麦上场的时候，太阳早已落山了，大地还在继续散发着白天吸收的热气，乡下蚊虫又多，人们都摇着“蝇甩子”坐在院中乘凉。这时我正和周师长（六军三师师长，外号周大炮）沈万山（搞两面政权的三甲甲长）坐在尚家街韩福林的院子里，研究新麦打完后如何给军队送粮的问题。我接到这个情报后，立即和周师长、沈万山二人商量。周师长和我都主张：立即转移；而沈万山则说：“日本鬼子那天不出来？不见得见人就杀！咱们在鹤立也有内线，怎么没听到这个消息呢？我又才从鹤立回来的，没听到什么动静……”他不主张立即转移。这里有另外一件事情需要加以说明：沈万山与韩福林的妻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沈一因麻痹大意；二因贪恋在韩家住下，才这样主张的。不幸的是，沈万山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周师长。虽然我和周师长连夜转移到尚家街南二十里外的虫乡；但却没及时提出抵抗办法，也没跟当地老百姓打招呼，没动员他们疏散防备，以至直到敌人站到他们跟前时，还没有丝毫思想准备。

第二天东南响时，我们从虫乡望到尚家街烟火冲天，久久不散，知道惨案终于发生了！我和周师长都非常懊悔。当

天下午我们派出探听消息的人回来向我们报告惨案发生的经过。我和周师长又回到尚家街组织外村的人处理善后，把一些妇女和儿童安排到就近几个村子里去。自然沈万山也未能幸免。据当时亲眼看见惨案发生的几位妇女的学说及现场给我们的印象，惨案的经过是这样的：

上午八、九点钟的时候，村子里男人都在场院里打场，妇女有的在村近处麦地捡麦，有的在家中操持家务。忽然有几股日寇从四面八方兜了进来，从各个角落把男人抓到，用麻绳倒剪两臂捆绑起来，用刺刀逼着赶进村中间的新盖的三间草房里；并在这三间房子周围堆上柴草放火烧房！顿时火光冲天，呼声遍地，一种生的愿望，死的威胁，在极短促的时间里给人们提供了恰当的选择——反抗！

在烟火弥漫的屋子里，人们互相解开绳索，顺手抄起各种“武器”——菜刀、斧头、掏灰耙、扫面杖……向门冲去，向窗冲去；外面的女人、孩子们狂吼怒叫向火光扑来……这是一场一群徒手平民与手持杀人武器强盗的搏斗……能够跑出燃烧着房屋之外的人，又被日本强盗赶到附近一眼水井前，被逐个推入井中。有两个军官打扮的日本鬼子，手握战刀站在井边监视着这种惨绝人寰的勾当。这时又有几个日本兵用刺刀逼着几个中国人向井边走来。当那几个中国人在接近那个杀人监视者的一瞬间，有的用头撞，有的用手拉……两个日本军官还没来得及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连人带刀同几个中国人一起滚进井中！

这真是兔死狐悲，几个日本鬼子趴在井沿上探头向黑咕隆冬的井中望去，高声叫骂着。他们要打捞自己的同类，要打捞枪支、战刀。“谁下去？”

日本人下去吗？井下尚未溺死的中国人是不会叫他们生还的！而到此时，全村青壮年男人除了被火烧死便被推入井中，连一个可以利用的人都找不到了。日本鬼子在一片慌乱中匆忙地找来了两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向他们比比划划，意思叫他们下井，并表示：如捞上来不但不杀，还“金票大大的给。”

两个孩子点头同意了，各站在柳罐的一边，四只小手抓住柳罐绳，被运下井去；谁知当柳罐接近水面时，两个孩子同时头冲下钻进水中……任凭上边的鬼子如何吱哇乱叫，所能听到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回音——两个孩子早在下井之前已经决定与他们的父兄们一起赴难了！

中国人民的悲凉壮举，又一次使日本鬼子兽性大发——一挺机枪对着井下射击起来，子弹连续爆发的回音在长满青苔的井壁上回旋、上升……

事后，我们用很大力量到处找尚家兄弟，准备处置他们，始终未能找到。

前些日子听汤原的同志讲：在城东裕德附近找到一眼早年屯埋的井，开掘后从中找到累累白骨。我不知道这里是否就是尚家街旧址？因为在汤原境内当时发生的惨案太多了。

四、一九三七年“九、一八”大暴动

一九三七年九月初，倪忠尧所领导的游击分队，得到一份来自佳木斯的情报，说有一股日军要经过乌龙河桥去汤原县城。这支三十多人的队伍连夜在桥两岸埋伏下来，河东岸桥东北方是一片高出人头的线麻地，桥西岸西北方是一簇簇参差不齐的坡岗棵子和荆棘丛，从这两处同时射击即能对桥

封锁，形成交叉火力网。队员们在这两处掘出战壕，坐在里面单等敌人到来。次日八点多钟，观察哨发现东面的地平线上有两股烟尘腾起，最后判明是两台高悬“膏药”旗的日本军用汽车向这边驶来；但在离河一里之外，又停了下来。从望远镜对这边进行观察。接着车上几挺机枪向桥这边扫射过来……埋伏在掩体里的游击队员明白：火力侦察。他们一边准备战斗，一边屏心静气地等下去。果然在枪声之后两辆汽车又慢腾腾地向这边开过来，终于提心吊胆地爬上乌龙河木桥。顿时两岸枪声爆豆般地响了起来，手榴弹也开始在桥上爆炸了。日本鬼子连滚带爬下了汽车，有的钻进汽车底下进行顽抗，更多的则是跳到桥下，借堤岸的掩护顺河向南逃跑了。倪忠光游击队这一伏击战中，击毙日寇二十余人，缴获机枪两挺，步枪二十余支，还有军用饼干，罐头等物，两辆汽车也被炸毁了窝。

这一仗发生在我区境内，我们知道日寇必来报复，于是立即动员附近各村里的青壮年迅速转移。果然，当天下午从汤原、鹤立、佳木斯来了几队日本守备队和伪军，还有日、伪老兵在内。他们先把汽车上的汽油倒在桥上，然后把汽车拖走放火烧桥。以后，这个仅剩几根光秃秃桥桩的所在，就叫“火烧桥”了。

这之后，汤原日本守备队，在干家粉房驻扎的日本守备队，确立镇以杜木方为头目的警察署在这一带大肆搜捕，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直弄得十室九空。

一九三七年“九、一八”前夕，我们接到通知，叫地方组织发动群众纪念“国耻日”。日寇在一九三七年发动“七、七”事变之后，又于“八、一三”大举进攻上海，并扬

言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国难家仇进一步触动了这一带人们心中的火山，仇恨的岩浆借着纪念“国耻日”的势头，猛烈地喷射开来——人们从家门走出来，疏散出去的人们从山洞里，从林莽中走出来……这些蓬头垢面的人群，象从地狱中跳来的魔鬼，他们手持棍棒刀枪，砖头瓦块迎着武安到牙齿的敌伪军警围去。很多屯子插上红旗，墙上刷上抗日的标语，并提出：“打不服日本鬼子，只有死！”，又给日本守备队的头目越明写信，叫号说：“你不是每天找抗日队吗？现在我们来到你的眼皮底下了，你出来了吧！”

成千上万愤怒的群众汇成一股势不可挡的铁流，专门往有鬼子、伪军、自卫团的地方冲去；往日气焰不可一世的敌伪军警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而闻风逃窜。有的人是趟着没腰深的河水逃走的，岸上到处是他们的坟墓。守备队的头目越明刮去半尺多长的胡子，摘掉眼镜，乘黑夜穿便衣逃回佳木斯，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们这些地方干部也混在数不清的人流中从一九三七年“九、一八”凌晨起到处冲击敌伪军警，并同时破坏交通，通讯线路。佳鹤铁路从莲江口到鹤立段大部电杆被锯倒，电线被割断，电葫芦被砸碎，并掀翻铁路三百余米……直到次日傍晚人们才象吐口怨气似的逐渐散开。

这一次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活动，挫败了敌伪的锐气，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和必胜信心。

以上几段往事，是我从部队转到地方以后亲身经历的。因为年深日久，很多细节已经记不清了，甚至为抗日事业献身某些烈士的名字我也没记住，我深感对不起他们。这段时间正是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指出的：敌强我弱阶段，

但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并没有屈膝投降，而是用自己的鲜血
和生命保卫了我们可爱的祖国！

电报生涯五十年

陶诒谔口述 刘天光整理

在旧社会里，电报行业虽不属于“三十六行”，但它也和“三十六行”一样是有帮派的。一般都通过亲友关系把自己的近人拉到自己的身边，希图有一个终身职业。

我就是通过我父亲是老报务员这样的家属关系进入电报行业，而且一干就是五十年。

一九三〇年我跟父亲学习英文和电报业务，伪满时期从练习生开始到正式上台整整干了十四年，“八、一五”后，先做电报业务工作，后在学校专门辅导电报技术，一直工作到一九八二年退休。

在伪满时期，我们陶氏家族，直系亲属就有四人在佳木斯电报电话局工作过——我父亲是老报务员；我大哥陶诒铮是管庶务（现在的总务）的准职员；大妹陶宝珍在话务上工作；我做报务工作；此外，还有通过我们的关系进入这里的一些亲属。实质这也算是个“帮”。

一、我父亲是佳木斯电报事业的创始人之一

在二十世纪初，因受洋务运动影响，我国的电报电话事业有了一定地发展，但电报电话的通讯技术，特别是电报收

务技术基本上是掌握在洋人手里。机器设备当然是洋的，就是业务用语也是“洋话”——英语是这一行业的唯一用语。因此，不具备较高的英语水平，不仅不能上台拍发电报，就是日常收受电报业务也不能胜任。我国东北开发较晚，科学技术进展迟缓，所以从事电报业务的报务员都是从苏、沪、滇、粤等地特邀的南方人。据先父讲，旧中国只有两处正式电报学校——一在云南；一在上海。执教的不是留过学的中国人，就是外国人。在东北电报学校，还是“九·一八”以后才由日本人创建的。校址在沈阳，名叫“奉天电报学校”。

我父亲名叫陶寿康，字子信，祖籍江苏省吴县，生于一八七六年，死于一九三九年。早年在上海电报学校学习电报业务，精通英文。一八九六年，当他二十岁时被派来东北，先到奉天（现在沈阳市）；后调第三站卜奎（现在齐齐哈尔市）；以后又调来三姓（现在依兰县）；最后于一九二二年调来佳木斯。他先后经历了清朝，军阀割据的张作霖及伪满三个朝代，其中有三十八年在东北四个地方电报局主持电报业务。以常规而论，住电报局的几乎都是终身不动的；而先父先后被调动四个地方，都是想要借助他的高超的电报业务能力开创电报业务局面并为之培养造就新一代的电报人员。一个南方人，早在二十年代就能跋山涉水远离家乡来到荒漠的东北从事电报事业，并为造就人才而付出自己的心血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二、“九·一八”事变前的一些情况

一九二二年，我四岁的时候，随我父亲由卜奎（现在齐